



七十年代 西行漫记

[美]海伦·斯诺 著
安 危 剑 华 译

[美]海伦·斯诺 著
安危 剑华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七十年代西行漫记

记

七十年代西行漫记

(美)海伦·斯诺 著

安危 剑华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5 插页 9 字数 11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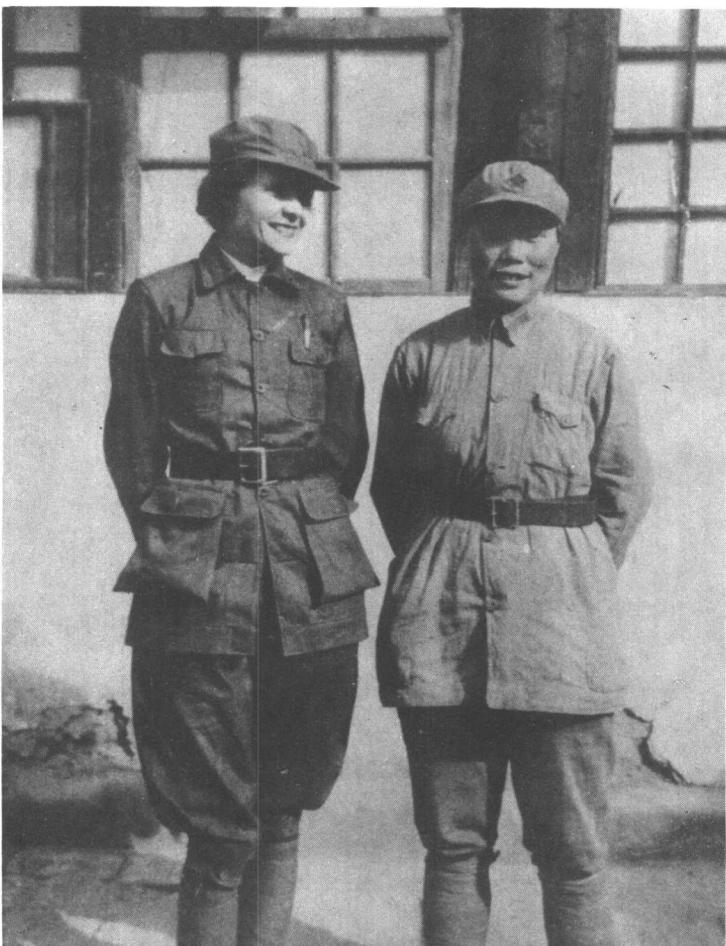
1981 年 11 月第 1 版 1985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0,001—40,240

统一书号：10094·332（精）定价：2.00 元



1937年5月作者在延安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
林伯渠同志拍的合影照



作者与康克清同志在延安合影（1937年5月）



作者近照（1978年去志丹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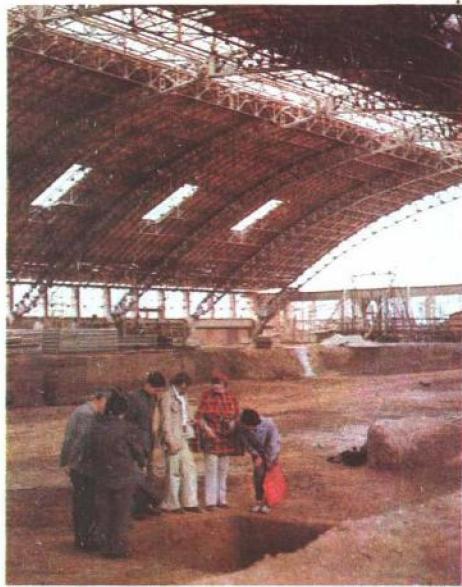
王震同志和作者在西安交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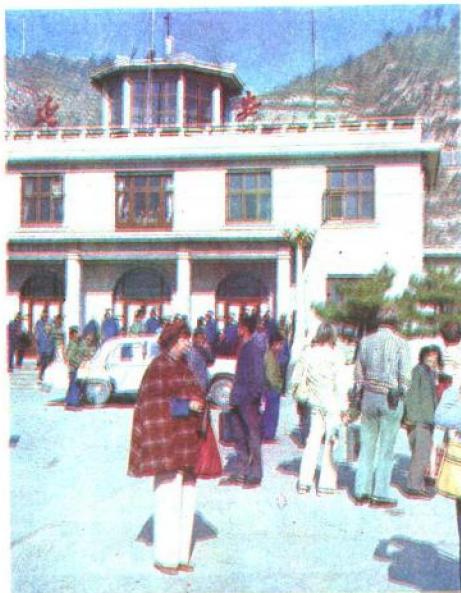
王震同志、王林同志（左三）、鲁曼同志（左二）
同作者和电视摄影组的朋友合影



作者和谭冰同志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作者和电视摄影组参观正在建设中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作者在延安



作者在延安革命
纪念馆参观

彩色照片系孙毅夫 摄



作者在西安参观她1937年住过的一所宾馆。图为作者在向美国电视工作者介绍自己如何在夜间从这里逃出并前往延安的经历
孙毅夫 摄



作者同她率领的美国电视摄影组访问志丹县（保安），受到群众热烈欢迎

孙毅夫 摄

再 版 说 明

本书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欢迎。这次再版增收了作者写的《古城西安历险记》和《西行前后》两篇回忆录。

一九八四年六月

目 录

历史的回顾（代序）	(1)
踏上西北的故土	(26)
摄影机的角度	(36)
西京招待所	(43)
一九三七年的红军总部	
——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纪念馆访问记	(51)
王震和王林	(61)
守卫秦陵的兵马俑	(70)
中美友谊——四十二年之后	(82)
去保安之路	(90)
黄土之乡	(97)
康家沟	(111)
附录：	
保安行	(118)
古城西安历险记	(130)
西行前后	(158)
译后记	(167)

历史的回顾（代序）

我和我的丈夫埃德加·斯诺常常感到，我们自己在本世纪三十年代的活动，成了中国西北形势的一部分，我们是那些和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了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的东北难民们的特殊朋友。为了寻求真理，我们心甘情愿，冒着一切风险，于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分别完成了我们的西北之行，并把事实真相公诸于世。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们在美国驻日本东京大使馆结了婚，然后，去南洋进行了一次漫长的蜜月旅行，最后，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到达北平（即北京，下同）。我们从日本出发，经过台湾、婆罗洲、苏拉威西、爪哇、巴里，取道新加坡，回香港、广州，然后，乘汽轮沿中国海岸北上，一路上参观了条约规定的所有通商口岸^①。一九三一年，我携带两卷一九三〇年出版的斯彭格勒写的《西方的衰落》，已经到过中国。使我惊讶的是，他的理论，正好赶上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九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萧条时期。……那时，英帝国统治着世界上一个很大的区域。荷兰帝国统治

了印度尼西亚；法帝国统治了印度支那和别的一些地方。埃德② 和我旅行期间，一直在研究没落的西方帝国将要发生的情况。我们明确无误地意识到日本取代西方、占领中国的企业。我们一到北平，就在煤渣胡同二十一号一座中国式的小房子住下，埃德便坐下来，写了一篇题为《西方声誉下跌》的长文章。他不知道该把这篇文章寄往何处，因为他通常给《纽约先驱论坛报》撰稿，每篇稿酬约一百五十美金。我坚持不让他删改，给《星期六晚邮报》寄去。该刊当时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杂志，稿酬也最高。他断定，人家不会考虑采用这篇文章，嘟囔了好半天，最后还是采纳了我的意见。

几周后，我们去拿家里寄来的邮件，发现了一个从《星期六晚邮报》寄来的小小的开窗信封③。然而，我们以为是要求预订报纸，甚至没有立即拆阅。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小纸片（支票），上面写的数字是 \$ 750.00——我们以为是打字打错了，可能是 \$ 7.50 之误，充其量是 \$ 75.00。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坐上我们私人的黄包车，去国立商业金融银行（当时美国在华的唯一银行）。“这张支票是真的吗？能不能存？”埃德无法相信自己的好运。银行出纳员毕恭毕敬地看了看埃德说：“是真的，当然能存。”一元兑换成五元，我们靠这笔款子，过了好一、两年。

那篇文章是来自美国方面支持中国独立的最初例证之一，也是极力反对已于一九三一年侵占了满州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例证之一。埃德的名字，从一九三一年起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他无论到哪一个日本占领区去，总要成为

日方的攻击目标。对美国一家最大的、最有影响的杂志来说，发表这样的观点，是形势变幻的一个重要标志。^②与此同时，埃德的第一本书《远东战线》，在纽约由史密斯和哈斯出版公司出版了。埃德是第一个报导日本占领满州的外国记者，也是第一个报导一九三二年上海之战的外国记者。这些事件，都是我们身临现场，耳闻目睹过的。

我俩都反对在中国领土及其他地域的外国“帝国主义”，我们想，是改弦易辙的时候了，美国应当反对日本接管中国的计划——原则上应该如此，当然不能去积极参战。那时，英国人犹豫不决，因为他们和日本人签有军事条约，中国一旦被日本占领，他们中的一些人企图瓜分中国。只有美国人能够采取公开的、积极的立场反对日本人，埃德和我都意识到这一点。于是，我们决定支持美国人应当支持的事情。与此同时，埃德还是英国工党报纸《伦敦每日先驱报》驻远东记者。这家报纸，是费边式的社会主义工党的喉舌，是反法西斯的，然而却没有任何制止希特勒、墨索里尼以及日本的真正政策。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到了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及其一帮，已在竭力仿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我把它叫“次法西斯主义”，因为它还不是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而只是“卖国主义”，后来，欧洲人把它称作“吉斯林主义”^④。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期间，埃德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我获准在所有的英文班听课，还包括一个讲授黑格尔的中文班，我是这个班里唯一的外国人（燕京大学当时只有六个外国人）。张东荪是我的老师，后来成了我们的朋友。

一九三七年，他和我们一道，使我们主办的《民主》杂志得以创刊。我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思想工具，开始更透彻地了解中国。那时，华北死一般的寂静——土肥原将军打算利用中国的傀儡，一枪不响地占领华北。这个阴谋很快得逞了。无论是蒋介石还是北平当局，都制止中国人公开反对。没有一家中国报纸敢于刊登事实真象。

我拚命地写作反法西斯的文章，反对在中国实行法西斯主义，反对复活儒家学说。儒家学说的复活，是中国实行真正的法西斯主义的信号，这意味着要倒退到先前封建思想意识之中去——崇拜祖先、亲族政治及裙带关系。然而，我的文章当时未能发表，其中一部分文章和我的学生运动资料以及许多照片，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期间，存入加里福尼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里的《尼姆·威尔斯文集》。我怕这座小木房着火。麦卡锡时期^⑥之后，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七〇、七二年间，任何一个进步作家，根本不可能通过美国有广泛影响的宣传工具，发表任何关于中国的东西。

凡是法西斯主义主张的，埃德和我都予以反对。一九三五年在北平，我以反法西斯的主要中坚人物而自居，整天价寻找、思考反法西斯的东西。一九三五年秋，燕京大学学生运动的新任领导人，开始到北平城内盔甲厂十三号来找我们，当时，我们已从海淀搬到了那儿。

这些燕京大学的学生破釜沉舟，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第一个来找我们的是张兆麐，他是满州的难民，义愤填膺，爱国心切。他想了解了解东北义勇军的情况，因为埃德到那儿